

月薪一斤包谷 VS 6000万年薪

【中国观察之椿桦专栏】

代课教师拿40元月薪，当然是低得与时代脱节，但这却算不得新闻。在我们刚刚听闻统计局宣布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又上涨了多少之后，一条关于代课教师年薪只有365斤包谷的新闻让我的眼镜跌落在地。

这位教师名叫李兹喜，在贵州罗甸县班仁乡金祥村油落小学已任教13年。据《贵州政协报》7月29日报道，李老师全年的工资收入是学生家长凑份子的365斤包谷，按当地每斤8毛钱市场价计，他的月薪相当于8毛钱，月薪相当于24元。李兹喜19岁开始就承担了金祥村全部的教育重任，他既当教师，又当校长，同时还是勤杂工。除了上课，

他还要到山下背水给孩子们喝。学校经费紧张时，他甚至把家里的猪换成了学生的课本。而他自己家里却经常断粮，以至于不得不请求家长们将包谷提前给他。

原以为，经过教育部的清退以及舆论的持续关注，代课教师早就不是个问题了。但近几天连续披露的“代课教师工资试比低”的新闻实在令人脸红——7月21日，另有消息说，贵州务川县黄都镇的小学老师杨贤祥，办学22年，仅靠44.5元的工资养活家庭。我们这些貌似与李兹喜无关的人，拿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他们的工资，但在他们面前，生活的优越仿佛成了一种罪过。但我们不能确保那些最该脸红的官员是否脸红了。毕竟，这

样一种本不该发生的新闻，还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

就在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平均工资增长的好消息时，我们还在抱怨自己的工资并没有涨。这说明，我们都以为自己的贡献是超值的。于是就想起了平安老总马明哲先生，他前几天曾公开宣称，他的贡献对得起6000万年薪。但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代课教师们，为何不曾在待遇上斤斤计较？原因无非是：他们是“代课”教师，没有名分；他们热爱教育事业，不计较报酬。

然而我却要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他们的工资远远对不起他们的贡献！包括平安在内的企业高管宝座，从来不乏竞争者，但代课教师却是无可取代的，没有他们，贫困地区的

孩子们很可能无处读书——那些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教师，几乎没人屑于去大山深处教书育人，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清退民办教师之后，代课教师并没有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这些代课教师，有知识有文化，外出当个清洁工也至少会拿到数十倍于现在的工资收入。如果不是怀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他们何以从青丝坚守到白发？

教育的虚弱是人民的虚弱，教育的穷困是未来的穷困。在这些代课教师面前，谁有底气宣称自己是无可替代的精英？这样看来，政府一刀划开“公办”与“代课”的鸿沟原本就是失策的。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

■相关评论

平凡的李兹喜用自己的理想、信念延续着贫困地区的教育传奇，但如果没有制度作支撑，像李兹喜这样的“包谷老师”是难以复制的。

近年来，国家对教育事业给予了政策支持，从加大教育投入到师范生免费制度，无疑都让师生心生期待。特别是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既可以保证贫困生完成学业，又把优秀学生吸收到教师队伍里来，还能营造尊

■相关评论

当一个为国民教育竭诚服务的好老师不应当如此艰难，以至于眼看要压弯了生活的脊梁。教师职业光明背后的灰点，无非拜“代课”二字所赐，而它又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二元制教育城乡割裂的事实。

被称为教育大后方的乡村某种程度上是被公共服务

“包谷老师”是难以复制的传奇

师重教的氛围。这对“求师若渴”的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无疑是好事。

但也应该承认，教师的经济待遇与社会地位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异。发达地区留住教师并不难，难的是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如果教育发展不均衡不解决，如果贫困地区相关条件不改善，教师的工作绩效与薪资待遇不对等，他们的人生价值得不到体

现，仅有村民的满腔热情与孩子淳朴的期待，不仅公办教师不愿来，就是代课教师也留不住。

李兹喜的遭遇实际上是贫困地区教育现状的一个缩影。要彻底改变贫困地区教育面貌，留住贫困地区教师，相关制度设计应考虑得更加周全和细致。除了加大教育投入，落实两免一补政策以外，贫困地区教师生活、工作条件艰苦的问题必须引起足

够重视。

加强各项综合配套设施建设，加快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切实改善贫困地区与薄弱学校教师的经济待遇、工作条件，显得十分迫切与必要。否则，即使国家培养了“免费师范生”，他们也不会安心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生根发芽。贫困地区的公平教育权利仍然是可望不可即。(胡艺)

教师间不该有巨大的权利鸿沟

忽视的，而教师资源极度匮乏下所催生的“代课老师”，只因身份“特殊”而无从享受一切正常待遇，心灵的芦苇在萧瑟的制度寒风中飘摇不定，能够有多少人坚持到底，实在是一种残忍的逼问。

义务教育的终极意义之处，不仅在于学费减免的经济计算，更指向国民基本

权利的平等归属。国家对义务教育投入长期欠债的逐步偿还，权利在更多孩子“有书可读”中日渐清晰。义务教育暂时填平了孩子之间受教育权利的鸿沟，却留存了教师之间的权益藩篱。事实上，不仅是乡村代课教师，城市中

所谓在编教师与聘用教师、公办学校教师与民办学校教

师之间所获得的政策扶持、社会保障、经济收入、社会名誉等，都存在巨大的差距。

权利不能被免费成一纸空文，否则乡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就会难以维系；别让城市聘用制老师、民办学校老师沉默于制度记忆的阴影中，那将是整个民族的不可承受之重。(毕炯)

弹钢琴消民怨离“抚琴而治”有多远

■热点纵论

广州市文化局局长陶诚做客广州电视台“行风大家谈”节目，遭遇观众和主持人近2个小时不留情面的投诉和质疑。在节目结尾，这位音乐博士给市民弹奏了一曲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不少观众还在提意见投诉的市民忍不住跑过来跟陶诚握手，有的还盛赞“局长真是有德有才啊”。(7月29日《新快报》)

这一幕很具戏剧性，艺术果真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吗？民怨是真实的，市民赞赏官员才艺，并不能说明他们原谅了官员执政履职的乏力。文化官员能弹钢琴，见证了他个人的艺

术修养。但文化官员毕竟不同于音乐家，他最终能否赢得市民的信赖，靠的是行政执法的成效，而不是钢琴演奏的技艺，或者艺术修养本身。一个优秀的音乐家不见得就是一个好官员，只有真正解决好市民所诉所怨，艺术才华方能更有意义。在这一点上，履职能力是1，所有才华与修养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毫无价值。

但反过来讲，这一曲美妙的曲子亦有其存在的意义。一个官员在连遭近2个小时炮轰的情况下，没有暴跳如雷，没有脸色铁青，而是充满诚意地向市民弹奏鞠躬。这样的细节，传达了官员个体的谦逊风

度，亦见证了一个地方整体的政治文明的气度。有这样的风度和气度在，则民贵官轻的意识必得以确立，则顺民意而改进的工作原则必得以贯彻。故而，从市民赞赏官员的艺术造诣，到市民认可官员的职业能力，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未必不能够实现。只是，其间必然少不得奋发与努力。

传说孔子的弟子宓子贱做县令，身不下堂，弹琴读书，就把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后人赞为“抚琴而治”。后世以来，这个词往往被误解为官员的自我吹嘘。其实，它的深意还不为人所共知。宓子贱的后任县令疲于政务，就前去请教宓子贱何以轻松胜任。宓子贱

说，你忙于自己出力，我胜在善于用人。所以，所谓“抚琴而治”实际上隐藏着行政的规律与智慧。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要达到善治的境界，仅知人善任还远远不够，以人为本、恪守法度、广纳众议、讲求效率，如此等等都不可或缺。

这一点对于现代官员也不无启迪，一个城市的文化事业靠一个官员是不行的，市民向首长问责的要义，还在于首长严格问责于部下，如此方能成就满足公众意愿的机制。仅靠弹钢琴无法消民怨，但弹钢琴却未必不能看作实现“抚琴而治”的先声与宣言。官民互动，履职问责，民怨之消并非难事。(周东飞)

还有多少“花瓶法规”需要较真

■热点纵论

近日的天气炎热让人想起湖北省3年前出台的“26度限温令”。记者走访发现，宾馆、饭店、商场这些商业场所并未严格执行这一规定。湖北省经委电力处负责人表示，规定出台3年来他们确实没开过罚单，执法方面比较“宽容”。(7月29日《武汉晨报》)

按规定，对一个月内连续两次违规的，由供电部门在收取当月电费时按高峰电价结算。但供电部门则有苦衷，他们没有行政处罚权。这就把“限温令”置于架空的状态，跟“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绕来绕去之后就会发现，这只

是摆来看的花瓶法规。

如果不是天气炎热让人想起“限温令”，这“花瓶”还可以继续摆下去，但凡事最怕的就是较真，媒体一较真，“限温令”就现出“一纸空文”的真面目来。不知媒体报道之后当地政府会如何行动，是走程序为供电部门寻求行政处罚权，还是另指定有行政处罚权的部门去执行“限温令”，但无论如何，这都应该是3年前就应该做的事，不是今天。

“欣赏性”立法已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并不在乎能不能执行，而在乎好看。8月1日《反垄断法》施行在即，业界人士指出，相关的40余个配套规则迄今为

止无一出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宏伟质疑说“这如何实施？”没有人回答。或许也不屑于回答，或许立法者希望民众不要太过在乎实施问题，大家等着宣布生效那天举杯欢呼就好了。不知马上就要生效的《反垄断法》又要经历几年才会开出第一张罚单？

不止是“限温令”，不止《反垄断法》，还有许多“花瓶”摆在法律领域的案台上没人去较真。让这些法律法规从纸面上落到地面上还需要更多的人去做更多的努力，这也是一件考验公民意志的事。45年前，在华盛顿林肯纪念馆，马丁·路德·金向美国贤者们较真，“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

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但“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由此他发起了一场世界闻名的民权运动，并献出了生命。马丁·路德·金的伟大就在于，他让纸面上的东西落到实处。

虽然“限温令”在纸上还是在地上都不具多大意义，但仍有必要向那位较真的记者致敬，他的行动唤醒我们一种被遗忘的品质，就是跟纸面上的东西较真。“限温令”可以无所谓，但更多“一纸空文”就很有所谓了，甚至直接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品质。(范大中)

尴尬的“最大鼓励来自媒体”

【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

这真是一个壮观得有些过分的送别仪式，从来没有哪个新闻发言人的离职享受过这么大的尊严。

王旭明离开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去语文出版社就职，这事媒体都高调地“送”了一个星期了，至今仍“恋恋不舍”地送，每天关于他离职的新闻仍是热点，他仍在各大媒体不断发表他的离职感言。最新的感言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其实就是来自于媒体。

(7月26日《中新网》)最大的鼓励来自媒体，这并非王旭明卖乖，媒体确实给了他最大的鼓励。

有着57年历史的严肃政经大报《中国青年报》专门为他独立发行了一张对开两版的彩色专刊，40多位中青报记者为他策划了一个送别晚会，央视的白岩松以一期节目为其隆重送行，全国各大媒体拿出重要版面报道了他的离职，这种荣誉是史无前例的。鲜花与掌声，最大的鼓励来自媒体，这是王旭明的荣耀，却也是他的悲剧所在。

最大的鼓励来自媒体，这种表述中隐含着王旭明某种失落：那就是“上级鼓励”的缺位，上级没有媒体这么鼓励他。媒体这么鼓励他，给了一个离职者这么大的荣耀，那么他的上级、直接的顶头上司和他的主管部门怎么看待和评价他曾经的新闻发言经历呢？他自己给自己打了80分，媒体通过欢送给了他90分以上的高分，那么他的东家教育部给他打了多少分呢？

王旭明的离职，有媒体解读为他因个性发言而遭弃用，而王旭明则说自己还升

“成都拍楼”人大为何缺席？

【学者视线之葛剑雄专栏】

汶川大地震发生不几天，就在网上看到有关成都市行政中心的消息和照片，据称成都市的行政部门在震后几天就悄悄搬入耗资12亿新建的豪华行政中心。

前段时间，成都宣布市行政机关将迁回原处，该中心将公开拍卖，所得款项用于救灾。

随后几天，相关的官员又有补充说明，舆论也有各种说法。但至今尚未听到成都市人代会对此有何举措，也没有见到有哪一位人大代表发表意见。

我不明白，难道这样一件涉及成都市政府搬迁的大事当初没有经过人代会的讨论和批准？难道这样一项耗资十多亿、占地数百顷的大项目没有列入政府预算？如果都没有，何以成都市人代会不提出疑问或异议？如果当初都通过了，那么现在作出根本性的改变，是否还应该经过人代会批准？

我不相信成都民众对此事没有疑问或意见，也不相信这些意见反映不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有些意见未必正确，网上或民间流传的消息更会是非参半，但如能充分尊重民意，通过民主程序，包括进行必要的讨论和视察，不仅能使正确的决定得到民众的支持，还能使不实传言不攻自破。

比如外界对新行政中心的传言或真或假，月初我有机会去了一次，就得到了证实。戒备森严，防范过度是事实。我们乘的是市府机关的

半级呢。到底是升是降、是正常调动还是弃用，有关部门没有半句解释，甚至连一句客套性、礼仪性的“5年来王旭明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尽职尽责”之类套话都没有送给他，惟一的只是一张调令。对这一切，我想王旭明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是怎么回事，公众也能大体猜到怎么回事。

虽然他接受采访时嘴上说“个性发言未受领导批评”、“没有领导的支持可能两年都干不下来”、“部长从未让自己少说”，但这些掩饰不住他的尴尬。如果上级真鼓励他，为什么不让他继续干下去？为什么不给他的5年工作一个高调的评价？

所以他也只能自言自语地对自己的工作作出评价，只能暗含失落地说“最大的鼓励来自媒体”，也许包含着这样的幽怨：作为主管部门的教育部对他并没有什么鼓励。

按理说，一个在公众中有较大影响的官员的离职，主管部门应该给其一个评价，解释工作调动的原因并对其工作作出评价，可一边是媒体炒得这么热，另一边却是有关方面始终保持沉默，这显然耐人寻味。最大鼓励来自媒体，老东家一言不发地看着他离开，王旭明无限惆怅，王旭明充满无奈和委屈，他也就只能欲哭无泪地黯然离开了。

王旭明发布了这么多教育信息，可当他自己离开的时候，官方却没有发布一个“为什么让他离开”的消息；他在自己的发言生涯中从未说过“无可奉告”，但对于他的离职原因，他只能无可奈何地说声“无可奉告”。(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编辑)

车，进大门和进楼时都经过核对。其中一辆车还是厅级干部的车牌，因停在楼前而受到保安指责，几乎与司机发生冲突。

当我一位同人拿出相机时就受到保安的干涉，声称不许照相。要不是碍着主人的面子，我真想与保安争辩一番。但要如何豪华，显然是出于由建筑物外表而产生的想像。

至少在我到过的这幢办公楼中，看不到任何豪华的表现，楼内有中央空调，但会议室、办公室、会客室、资料室、阅览室的家具都一般，有的看来是旧的，厅级干部的办公室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会议室很紧张，都是水泥磨光地坪，没有铺地毯。走廊和楼梯的宽度适中，并没有过多的公用面积，据说有地下通道连接各楼。

当然其他楼或非办公楼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又如一些行政机关究竟是否在震灾发生后匆忙迁入，相关证据是无法改变的。如果组织一些人大代表视察一次，了解真相如何，民间的争议自会平息。

从已经披露的情况看，无论政府想得何等周到，成都市行政中心的搬迁并不那么简单，如已经迁入的机关是否全部迁回原地，该中心能否如期拍竣成功，此举是否会影响到建新区的功能，今后市府机关的南迁如何进行，诸如此类，按理都应该是人代会的议题，难道人代会就一直缺席下去？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

投稿邮箱:wfwcbxyh@vip.sohu.net
电话:025-84783646